

·版本研究·

## 楼昉《崇古文诀》版本新考

李 由

**内容摘要:**南宋楼昉所编《崇古文诀》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均有广泛流传,是一部颇具影响力的文章选本、批点本。其版本有五卷、十卷、不分卷、二十卷、三十五卷等系统,十分复杂。此前学者因所见材料有限,论述多揣测成分,难以说明各版本之间的关系。本文依据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唯一宋刊二十卷本全本《崇古文诀》,同时参考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孤本《古文集成》、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刻孤本《古今文章正印》,考证出宋刊二十卷本选篇有所缺失,三十五卷本存在混入《古文关键》批语、选篇的伪编问题,二者皆非楼昉《崇古文诀》的原貌。在是书复杂的版本系统形成的过程中,南宋后期的建阳书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楼昉 《崇古文诀》《古文集成》《古今文章正印》

南宋楼昉所编《崇古文诀》是一部重要的文章选本和批点本。然而,长期以来,《崇古文诀》的版本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是为一大缺憾。《崇古文诀》版本复杂,有五卷、十卷、不分卷、二十卷、三十五卷等系统,题名、选篇亦有不同。张智华《楼昉〈崇古文诀〉三个版本系统》<sup>①</sup>、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sup>②</sup>对相关版本都有所梳理。可惜,由于国内常见的是元、明刊三十五卷本,而唯一的宋刊二十卷本全本《崇古文诀》流传海外,保存在日本静嘉堂文库,学者难睹其真,因此在探讨《崇古文诀》的版本关系时,多陷于臆说猜测,难发其覆。笔者有幸在静嘉堂文库见到此书,得与三十五卷本仔细对校,同时参考学界较少注意的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孤本《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天禄琳琅旧藏宋刻孤本《新编诸儒批点古今文章正印》中引用《崇古文诀》的情况,综合其他材料,或可辨明楼昉手定本的原貌和二十卷本选篇的缺失以及三十

①载《文献》2001年第3期。该文认为《崇古文诀》五卷本、二十卷本、三十五卷本三种版本系统先后形成,并皆为楼昉所编。

②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中华书局,2004年,第241—258页。文中列述了各种版本的著录情况,但未说明各版本之间的关系。

五卷本的伪编情况，并得以进一步考察书贾在《崇古文诀》版本系统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 一、《崇古文诀》版本系统

今可知《崇古文诀》有五卷本、十卷本、不分卷本、二十卷本、三十五卷本等版本系统。其中，五卷本、十卷本不存，仅能从相关书目、序跋中窥其面貌。

### 1. 五卷本、十卷本、不分卷本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迁斋古文标注》五卷。宗正寺簿四明楼昉旸叔撰。”<sup>①</sup>是为五卷本最早记载。《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内府藏三十五卷本《崇古文诀》时说：“《书录解题》作五卷，《文献通考》亦同，篇帙多寡迥异，疑传写者误脱‘三十’二字也。”<sup>②</sup>四库馆臣的说法武断，不为学界所取。五卷本今虽不存，但残宋本《迁斋标注诸家文集》的发现使得学者确定五卷本确实存在过，陈振孙所记不误。

今藏国家图书馆的残宋本《迁斋标注诸家文集》，原为季振宜、潘宗周所藏，存六册三集，不标卷次。季振宜《延令宋板书目》著录：“楼昉《标注诸家文集选》十本。”<sup>③</sup>知国图藏本尚缺四册。张元济、潘宗周《宝礼堂宋本书录》对此本有详细著录，曰：“撰人题鄞人楼昉旸叔。全书不分卷。所采先秦文十三篇、两汉文十六篇、三国文二篇，叶号起第一至九十四，当为第一卷。唐文昌黎二十二篇，附李汉序，河东十四篇，叶号起第一至一百一，当为第二卷。宋文王黄州一篇，范文正三篇，六一十六篇，仅三十八叶，篇幅独少，然末叶已有余白，当为第三卷……是本标名微异……与陈振孙所言相合，是必同为一书……季沧苇《延令书目》有宋版宋人楼昉《标注诸家文集选》十本，是本卷首有季氏藏印四方，以册数计之，见存六册，所缺宋文约当四册之数，是必即季氏旧藏，且即为振孙所称五卷本也。”<sup>④</sup>概言之，张元济、潘宗周以为《标注诸家文集》虽不标卷次，仅存六册，但从叶号、选篇推测，其全本为十册，实分五卷，即为陈振孙所说之五卷本。

这一推断有一定的合理性，《标注诸家文集》的规模较像五卷，不过陈振孙既明确注明《迁斋古文标注》五卷，那他所见之本应该不是不分卷的《标注诸家文集》。而陈振孙曾为《崇古文诀》初刻本——陈森刻本作序<sup>⑤</sup>，按照常理，是书刻成之后，他必会获赠一部，因此他所著录的五卷本当是陈森刻本，这一点下文详述。有鉴于此，不分卷本《标注诸家文集》也不是《崇古文诀》的初刻本。

①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51—452页。

②永瑢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七，中华书局，1997年，第2619页。

③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27页。

④张元济、潘宗周：《宝礼堂宋本书录》第四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第62页。

⑤陈振孙序见于静嘉堂文库所藏宋刊二十卷本《迁斋先生标注崇古文诀》卷首，系影写自其他宋本《崇古文诀》。

又,《标注诸家文集》上有近人某跋曰:“此编即《崇古文诀》之初稿,《文诀》本之排编修益而成,不若此之简当精确矣。姚璫序《文诀》云:‘广文陈君鋐诸梓’,时宝庆丁亥。此编陈振孙序为宝庆丙戌,盖先成《文诀》一年。”<sup>①</sup>因此有学者以《标注诸家文集》为《崇古文诀》之初稿。如祝尚书先生认为:“以常理测之,或头年仅有标注稿七十七篇,刻为五卷,次年已增多,遂尽其所有而刻焉,即《崇古文诀》是也。”<sup>②</sup>祝先生此说有所误解。从张元济、潘宗周的著录中可知今存《标注诸家文集》为残本,“七十七篇”是现存三集之数,全本选篇不止于此。其实,陈振孙之序署“宝庆二年嘉平月(十二月)既望”,姚璫跋署“宝庆丁亥端月(正月)既望”,二者相差仅一个月,以常理推测,楼昉、陈森当是已编成选本后,再请陈振孙作序,陈振孙既言“得一百六十有八篇”,也说明楼昉已经完成了编选工作。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楼昉当无可能再次对选篇进行大规模的增删。换言之,楼昉手定本是在宝庆二年底编成、宝庆三年初付梓的,之前未曾刻过初稿本,因此《标注诸家文集》自然也不是《崇古文诀》的初稿。

总之,笔者以为将《迂斋标注诸家文集》看作是产生于陈森刻本之后、与陈森刻本相近的另外一种不分卷本比较合适。

陈振孙序称楼昉“采集先□□□以来迄于今世之文,得一百六十有八篇,为之标注”,可见陈森刻本的篇数是168篇,这也当是五卷本的篇数。之后,淳祐年间,楼昉的学生郑次申又“刊《标注》十卷”<sup>③</sup>,是为此书的十卷本。刘克庄为之作序,并记书名作“迂斋标注古文”,与陈振孙著录的“迂斋古文标注”之名大体相同。除了书名相近外,刘克庄序称“《迂斋标注》者一百六十有八篇,千变万态,不主一体”,与陈振孙序文所载篇数一致,也就是说五卷本、十卷本虽卷数不同,但篇数相同,均为168篇。

## 2.二十卷本

是本今存两种,皆题《迂斋先生标注崇古文诀》,一为黄丕烈、汪士钟、陆心源旧藏,今藏日本静嘉堂文库,笔者在静嘉堂文库见到此本。一为周九松、潘宗周旧藏,今藏国家图书馆,此本残缺,仅存卷四至十一、十九至二十,有邓邦述跋。

①静嘉堂藏本。半页十二行,行二十三字,白口(间有黑口),双黑鱼尾,左右双边,版心作“文诀几”、“文几”。有宝庆丙戌(1226)嘉平月既望永嘉陈振孙序(序文前半篇残缺、系补写)、宝庆丁亥(1227)端月既望延平姚璫跋、宝庆三

①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七《迂斋标注诸家文集五卷》,中华书局,2009年,第1250页。

②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第245页。

③《四部丛刊初编》本《后村先生大全集》(商务印书馆影印旧钞本)卷九十六《迂斋标注古文》作“十首卷”,《全宋文》据清抄本删去“首”字。

禊合沙陈森跋(此二跋系后人补写),选篇158篇。此本有黄丕烈手跋两则<sup>①</sup>,据跋文可知静嘉堂所藏宋刊二十卷本是朱叔英、周九松、叶石君所藏残宋刻的拼补本。朱氏藏本仅存卷首至卷八、卷十五至末,虽有残缺,但保留了完整的目录。此本原无陈振孙序,黄丕烈从夏容庵所藏宋本有序者影写。

②国家图书馆所藏残宋刻本。行款与静嘉堂藏本同,左右双边,细黑口,双黑鱼尾,版心书名题“古文几”、“文诀几”、“文几”。《宝礼堂宋本书录》言:“黄氏所得残本为周九松旧藏,此仅存卷四至十一、卷十九、卷二十,亦钤有九松印记,则是书之离散盖已久矣。”<sup>②</sup>此本现存篇目与静嘉堂藏本的区别仅在于其卷六之末无韩愈《赠张童子序》《南海神庙碑》,不过《宝礼堂宋本书录》已辨明是亡佚而非原缺,则仅从所存部分看,两二十卷本选篇一致。

### 3.三十五卷本

此本是元、明、清时期最为流行的版本,且有朝鲜刻本、和刻本。除卷数增多外,这一系统的选篇均在193篇左右,较五卷、十卷、二十卷本篇数大增。通过广泛考察中外藏书机构,可知这一系统有以下七种版本:

①《迂斋先生标注崇古文诀》,元刊麻沙巾箱本(以下简称元本)。此本前有宝庆丁亥姚璫跋,半页十一行,行二十一至二十二字,四周单边,黑口,双黑鱼尾。国家图书馆藏一部,收入《中华再造善本》;台湾“国家图书馆”亦藏一部,经比对,其与国家图书馆藏本同版,从版本磨损情况看,其刷印当早于国图本,此本仅存目录、卷三、卷四、卷八至卷十三。

②《迂斋先生标注崇古文诀》,正德二年(1507)广西按察司佥事慈溪姚镆桂林学宫刻本(以下简称姚本)。此本甚为罕见,管见所知,仅日本蓬左文库藏有一部。半页十一行,行二十一至二十二字,四周单边,黑口,双黑鱼尾。前有正德二年正月姚镆《重刊崇古文诀序》,卷末有宝庆丁亥姚璫跋。姚镆序称:“其板旧刻闽中,岁久磨灭,已不可辨。予至桂之四年,乃为嗣刻于桂林学宫。”与元刊麻沙巾箱本相比较,可以发现姚本是在元本的基础上修补而成的。此外,上海图书馆著录有正德二年姚镆刻本,然此本实为嘉靖十二年王鸿渐刻本,从刻工、拼版痕迹看,此本与下文将要介绍到的台湾“国家图书馆”藏王鸿渐刻本是同版关系。

③《迂斋先生标注崇古文诀》,嘉靖十二年(1533)庐州知府王鸿渐庐州郡斋刻本(以下简称王本)。前有闻人诠《叙刻崇古文诀》,次为姚镆《重刊崇古文诀序》,卷末为姚璫跋、王鸿渐嘉靖癸巳《重刻崇古文诀后序》、聂曼《跋重刻崇古文诀后》。此本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黑鱼尾。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天津图书馆等共著录十部,台湾“国家图书馆”、日本内阁文库亦有收藏。经比较,王鸿渐本是以姚本为底本,同时参考他本,重校重刊的。

①两跋见于二十卷本之末,亦见于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六,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298页。

②张元济、潘宗周:《宝礼堂宋本书录》第四册,第65页。

其刊刻质量明显优于元本及姚本。

④《迂斋先生标注崇古文诀》，朝鲜古活字本，今藏日本蓬左文库。半页十行，行十九字，四周双边，白口，双花鱼尾。此本与中土刻本较大的不同在于，中土本正文中处在行间的小字批语（旁批）在朝鲜古活字本中被转为小字双行夹注的形式，此盖由于活字印刷技术的限制。此本第一册封面内页有墨笔题记：“嘉靖十四年九月 日/内赐益阳君怀崇古文一件。”考“益阳君怀”为李怀（1488—1552），字顺之，朝鲜成宗李奤的庶子。嘉靖十四年为1535年，时朝鲜中宗李怿（1488—1544）在位。中宗是成宗嫡子，比李怀略长。可见此本是中宗赐予其弟李怀的内赐本，当属朝鲜中央政府所排印官版。朝鲜中央印刷多用金属活字，且印数较少，主要颁赐给高官、宗室等人，颁赐时以墨书题写包括时间、对象姓名、书籍名等内容在内的内赐记。一般将内赐记的年份看作是排印本的排印年，因此，可以推测在嘉靖十四年（1535）或稍前，朝鲜中央政府用金属活字排印了《迂斋先生标注崇古文诀》，并颁赐给朝中大臣、宗室成员。蓬左文库所藏本为骏河御让本，有御本印记，是德川家康的藏书。

⑤《新刊迂斋先生标注崇古文诀》（以下简称《新刊》），松陵后学吴邦桢、吴邦杰校正，笔者认为此本刻于王鸿渐本之后、嘉靖三十二年（1553）之前，此处不及详述。前有姚璫序、后有陈森跋。半页九行、行十九字、左右双边、白口、单白鱼尾。是刻传本颇富，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共藏二十馀部。台湾“国家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哈佛燕京图书馆、日本静嘉堂文库等均有藏本。

⑥和刻本《新刊迂斋先生标注崇古文诀》，日本文政元年至三年（1818—1820）昌平黉学问所翻刻吴邦桢、吴邦杰校正本，制成和刻本。日本内阁文库、饭田市立中央图书馆等机构有藏。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籍文集》第十九辑（1979年、古典研究会）收入。

⑦《崇古文诀》，《四库全书》本。此本删去行间批语、标抹，仅保留每篇题下总批语，失楼昉本原貌。其选篇与《新刊》一致，底本当是《新刊》。

七种版本大体同源，以元刊麻沙巾箱本为最早，而在刊刻的过程中，王本、《新刊》都曾参校他本，因此亦有不少差异。元本、王本的实收篇目192篇，《新刊》实收篇目为193篇。其中《新刊》，不仅多出陈森跋，而且保存的批点也常较他本为优，是三十五卷本系统中刊刻较精、影响较大、流传较广的版本。

## 二、楼昉手定本原貌辨析

从上文所述版本情况可知，《崇古文诀》版本的复杂性集中在选篇和卷数上。五卷本、十卷本、不分卷本、二十卷本、三十五卷本究竟是何关系？张元济、潘宗周《宝礼堂宋本书录》著录《迂斋先生崇古文诀》残本三册（即国家图书馆所藏宋刊二十卷残本），说：“《诸家》先出，文最少。姚刻晚出，文最多。此二

十卷本实为衔接前后之作。”<sup>①</sup>认为不分卷本、二十卷本、三十五卷本先后形成。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推论：“此序（指陈振孙序）与《书录解题》同出陈振孙之手，而楼昉之卷数，乃多寡迥异，岂其书固非一本，五卷者其初稿，二十卷者其后定之本欤？抑亦两本初无不同，而其卷数之增多，特是陈森锓板时之所分析欤？未可知也。”<sup>②</sup>将五卷本、二十卷本的关系问题付之阙如。张智华则认为三个版本系统先后形成，皆为楼昉所编，但未提出证据。而笔者通过对相关材料的分析发现，楼昉手定本是十分固定的，其篇目、篇数确定，刊刻后楼昉并无增删。五卷本、十卷本选篇均为168篇，这便是楼昉手定本的篇数，而选篇仅有158篇的二十卷本、193篇左右的三十五卷本均非楼昉手定本的原貌。

楼昉所编《崇古文诀》最早刊刻于宝庆三年（1227），这一点由陈森、姚璫二人的跋文可知：

迂斋先生深于古文，尝掇取菁华，以惠四明学者。迨分教金华，横经璧水，传授浸广，天下始知所宗师。森曩偕先生季弟为馆下生，就得缮本，玩味不释，恨未锓梓。适先生守莆，幸备冷官，因间叩请，尽得所藏，自先秦迄于我宋，上下千余年间，其颖出者网罗无遗轶。……宝庆三裸，合沙陈森謹跋。<sup>③</sup>

四明楼公假守莆邦，积其平时苦学之力，绚绎古作，抽其关键，以惠后学。广文陈君锓诸梓以传之……宝庆丁亥端月既望，延平姚璫敬跋。<sup>④</sup>

可见，《崇古文诀》是楼昉任教于四明、金华、太学时，为教授学子所编的教材。陈森曾于楼昉门下求学，故曾获此教材，但其时尚无刻本。宝庆年间，楼昉守兴化军，而陈森此时正担任兴化军教授，遂求得楼昉所编全本，于宝庆三年（1227）付梓。此次编辑、标注均出楼昉之手，是楼昉手定本，也是《崇古文诀》的最早刻本。

为这一刻本作序的是陈振孙。陈振孙此前做过鄞学教官、南城县宰等职，职位并不高，之所以请他作序，当是因为他在宝庆二年得到了充兴化军通判的任命<sup>⑤</sup>，成为楼昉的副手。为此书作跋的姚璫也曾担任兴化军判官。可见这次刊刻是兴化军政府的行为，陈振孙作序的性质与姚璫、陈森作跋一样，是在付梓之际，为长官楼昉作宣传。从陈振孙之序与姚璫之跋写作时间相差仅一个月来看，宝庆二年底、三年初，《崇古文诀》经楼昉手定，已经编成，由陈森负责刊刻。据《延祐四明志》，楼昉卒于兴化军任上，慈波推测楼昉卒于绍定戊子（1228）中秋以前<sup>⑥</sup>，也就是说在陈森刻本刻成一年后，楼昉即去世，其间当不及对刊本进行大规

①张元济、潘宗周：《宝礼堂宋本书录》第四册，第64页。

②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356页。

③《新刊迂斋先生标注崇古文诀》卷末。

④元刊麻沙巾箱本《迂斋先生标注崇古文诀》卷首。

⑤可参武秀成：《陈振孙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73页。

⑥慈波：《文话发展史略》，复旦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第128页。

模的补充、修改。楼昉去世后，其学生郑次申曾再刻《崇古文诀》十卷，刘克庄为之作序，从刘克庄的序中亦可明见楼昉手定本是168篇，未曾改变：

迁斋标注者，一百六十有八篇……迁斋楼氏，名昉，字旸叔，以古文倡莆东。经指授成进士名者甚众，其高第为帝者师、天下宰，而迁斋已不及见。今大漕宝谟匠监郑公次申，亦当时升堂入室者也，既刊《标注》十卷，贻书余曰：“子莆人也，非迁斋昔所下榻设醴者乎？其为我序此书。”余曰：“谨受教。”<sup>①</sup>

刘序所作时间不明，经考，此序当作于淳祐八年（1248）至十年（1250）这三年间。《延祐四明志》载楼昉“从学者凡数百人，最显者郑清之、应燄、郑次申、赵与欢”。<sup>②</sup>郑次申，鄞人，嘉定十年（1217）吴潜榜进士。据《八闽通志》，郑次申淳祐中以福建转运判官兼知建宁府，而淳祐中在郑次申前后以福建转运判官兼知建宁府的是包恢和史季温<sup>③</sup>。包恢《敝帚稿略》卷四有《宜黄龙磜寨记》，署名“淳祐戊申（八年）重五朝请郎权发遭福建路转运判官兼知建宁府兼劝农事节制左翼军屯戍军马借紫包恢记”<sup>④</sup>，而据《宋史·包恢传》，包恢不久就“以侍御史周坦论罢”<sup>⑤</sup>。且《八闽通志》载“（淳祐）十一年漕使史季温重建燕居庙”<sup>⑥</sup>，因此郑次申任职的时间当在淳祐八年至十年间，其刊刻《崇古文诀》，并请刘克庄作序的时间也应在此时。淳祐七年，楼昉的得意门生、刘克庄的好友郑清之再相，为太傅、右丞相兼枢密使，这便是序中所说的“其高第为帝者师、天下宰”。值得一提的是，楼昉去世后，刘克庄曾作《挽楼旸叔》二首，可见他对楼昉也颇为熟悉，他对《迁斋标注古文》的描述应可信。

总之，郑刻本距离陈森初刻本已有二十二至二十四年的时间，此时楼昉也已谢世二十多年。虽然郑刻本为十卷，但如刘克庄所述，郑刻本《崇古文诀》的篇数仍然与陈刻本相同，为168篇，足可证陈森刻本以后，楼昉生前未再对其手定《崇古文诀》篇目有过增减。

至于书名和卷数，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作“《迁斋古文标注》五卷”，刘克庄序作《迁斋标注古文》十卷，二者卷数虽有较大差异，然书名却颇为一致。笔者以为这一书名反映了楼昉手定本的原貌。相较于“迁斋先生标注崇古文诀”，“迁斋古文标注”更为朴实。不过，“崇古文诀”之名在宋末似乎更为流

①刘克庄：《迁斋标注古文序》，《全宋文》第329册《刘克庄》八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25页。

②马泽、袁桷：《延祐四明志》卷五，《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129册影印清抄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415页。

③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三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24页。

④包恢：《敝帚稿略》卷四，《四库提要著录丛书》据清乾隆翰林院四库馆臣辑永乐大典钞本影印，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594页。

⑤脱脱等：《宋史》卷四二一《包恢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91页。

⑥《八闽通志》卷四四“考亭书院”条，第10页。

行。王应麟(1223—1296)《四明七观赋》中称楼昉“又有文章授诀”<sup>①</sup>。且咸淳九年(1273),刘震孙为《新编诸儒批点古今文章正印》作序,批评当时流行的文章选本说:“有以《崇古》名者,未必皆《商盘》、《周诰》之作。”<sup>②</sup>可见南宋末“崇古文诀”之名较“古文标注”更为流行。

### 三、宋刊二十卷本选篇的缺失

陆心源曾推断静嘉堂藏宋刊二十卷本《崇古文诀》是此书的初刊本<sup>③</sup>,此说误。虽然二十卷本多能校正三十五卷本批点的讹误,刊刻颇精,但前文已明楼昉手定本、陈森刻本、郑次申刻本均为168篇,而二十卷本仅有158篇,已非楼昉手定本原貌。且陈振孙序中赞赏楼昉“至于伊川先生讲筵二疏,与夫致堂、澹斋二胡公所上高庙书,彼皆非蕲以文著者也,而顾有取焉,毋亦道统之传接续孔、孟,忠义之气贯通神明,殆所谓有本者非耶!”提到楼昉选了胡寅、胡铨的上高宗书,而三十五卷本中有胡寅《上皇帝万言书》、胡铨《上高宗封事》,但仅存的两种宋刊二十卷中均无此二篇。除了借助陈振孙序来考察宋刊二十卷本的缺失外,今藏国家图书馆的宋刻孤本南宋王霆震编《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sup>④</sup>、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宋刻孤本南宋刘震孙编《新编诸儒批点古今文章正印》亦是不可多得的材料。二书大量引用迁斋批语,包括篇题下的总批和行间的批语,经与宋刊二十卷本《崇古文诀》比勘,笔者发现二书都非常忠实地过录了《崇古文诀》的批语,与宋刊二十卷本相合,可以纠正三十五卷本之误处甚多,纠正宋刊二十卷本的误刻处亦有不少,盖依据较好、较早的宋刊本过录,是我们探索宋刊《崇古文诀》面貌的可靠材料。《古今文章正印》原为清乾隆帝天禄琳琅旧藏,有咸淳九年(1273)刘震孙、廖起山序,当刊刻于咸淳九年。而据笔者考证,《古文集成》的刊刻时间约在宋理宗景定二年(1261)或稍前。元末明初人危素为元初吴澄所作的《临川吴文正公年谱》“(景定)二年辛酉”条载:“(吴澄)十三岁大肆力于群书应举之文,尽通。公于书一览无不尽记,时麻沙新刻《古文集成》,家贫,从鬻书者借读,踰日而还之。”<sup>⑤</sup>可见《古文集成》是南宋理宗景定二年(1261)或稍前刻于福建建阳的麻沙本,是一本指导举业的用书。

《古文集成》引用带有迁斋批语的篇目共计56篇。其中包括宋刊二十卷本失收的胡铨的《上高宗封事》(题作《绍兴戊午论和议封事》)。此外,见于《古文集成》、三十五卷本《崇古文诀》而不见于宋刊二十卷本的篇目还有:韩愈《燕喜

①赋见《延祐四明志》卷一,第173页。

②据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宋刊本。

③陆心源《仪顾堂集》卷二十《宋板崇古文诀跋》曰:“盖是书初刊本也。”《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27册影印清光绪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30页。

④本文依据《中华再造善本》(据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影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

⑤危素:《临川吴文正公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36册影印乾隆二十一年刻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318页。

亭记》《答李翊书》、李翱《答皇甫湜书》、胡寅《论遣使札子》《再论遣使札子》共五篇文章。不见于残本《迂斋标注诸家文集》的有：韩愈《燕喜亭记》《答李翊书》、李翱《答皇甫湜书》、司马光《谏院题名记》共四篇文章。不见于今传《崇古文诀》各本的有：唐庚《阆州新政县颜鲁公祠记》。可见，王霆震所据《崇古文诀》与宋刊《迂斋标注诸家文集》、宋刊二十卷本《崇古文诀》均不相同。宋刊二十卷本选篇158篇，除了缺少胡寅、胡铨的两篇文章外，还当缺少《古文集成》中引用的六篇文章。

《古今文章正印》中，与《古文集成》同引迂斋批语，而不见收于宋刊二十卷本《崇古文诀》的篇目有韩愈《燕喜亭记》《答李翊书》、李翱《答皇甫湜书》、唐庚《阆州新政县颜鲁公祠记》。此外，二十卷本未收、见收于三十五卷本的韩愈《送石洪处士序》也被收在《古今文章正印》后集卷一，所引迂斋批语同于三十五卷本，若加上这一篇，二十卷本失收篇数达九篇。

从二十卷本失收篇目的特点推测，造成失收的原因当是书商抽去楼昉手定本的某些篇章造成的。在三十五卷本中，二十卷本失收的韩愈《燕喜亭记》《送石洪处士序》《答李翊书》顺次排列于卷十一之末，是所收韩愈文章的最后三篇；李翱《答皇甫湜书》排在柳宗元与王禹偁文之间，是最后一篇唐人文；胡寅《上皇帝万言书》《论遣使札子》《再论遣使札子》顺次排列于卷三十三、三十四；胡铨《上高宗封事》是卷三十五第一篇文章。除这些以外，二十卷本与三十五卷本共同篇目的排列顺序大体一致。可见，二十卷本的编者是抽去了排在卷末或卷端的几组文章，并且有意删去了一些篇幅较长的作品，如胡寅、胡铨的文章。这些改动可能是书商为了缩减成本所为。

#### 四、关于三十五卷本的伪编问题

现存三十五卷本选篇193篇左右，超出楼昉手定的168篇，显然篇目上存在窜伪问题。而在一些与二十卷本共有的篇目中，三十五卷本的批语也有窜入《古文关键》批语的情况。以下拟对这两方面展开辨析。

三十五卷本卷十九选有欧阳修《送徐无党南归序》，此文不见于《迂斋标注诸家文集》、宋刊二十卷本《崇古文诀》。《古文集成》前甲集二、《古今文章正印》后集卷三皆选有此文，但篇首、文中皆无迂斋批语，仅有吕祖谦《古文关键》的批语，可见王霆震、刘震孙所据《崇古文诀》皆无此篇。而三十五卷本《送徐无党南归序》行间批语不多，但四条批语有三条与《古文关键》完全相同，且点抹也与《古文关键》极其相似。楼昉师承吕祖谦，其批点中有《古文关键》的影响并不奇怪，但像这篇文章一样相似度如此之高者在《崇古文诀》中并不多见。从这一例看，三十五卷本较楼昉手定本多出的25篇文章中，有的是从《古文关键》中抄过来、稍稍改头换面形成的。虽然由于材料不足，无法一一判定25篇的混入途径，但可以推论抄袭、改编其他选本，是三十五卷本《崇古文诀》形成的方式之一。

此外,不见于《迂斋标注诸家文集》、宋刊二十卷本《崇古文诀》,惟见于三十五卷本的王禹偁《寿域碑》,《古今文章正印》别集卷十有收,但通篇无批点,可见刘震孙所见《崇古文诀》亦无此篇。三十五卷本中,此篇除有少量旁线标示外,批语仅有总批一句“此篇造语新奇”,颇为简陋,殆亦伪编。

除了选篇有窜伪外,三十五卷本与宋刊二十卷本相同的一些篇目中,也有窜入《古文关键》批语的情况。一般来说,相较于宋刊二十卷本,三十五卷本脱行间批语的情况较多,但奇怪的是,有时三十五卷本会比宋刊本多出不少批语,而借助《古文集成》、《古今文章正印》可以发现这部分批语混入了颇多《古文关键》的批语。《古文集成》、《古今文章正印》并引《古文关键》、《崇古文诀》时,以“吕曰”、“楼曰”以示区分。然在《古文集成》、《古今文章正印》中被标明是“吕曰”的内容却出现在三十五卷本《崇古文诀》中,而这些内容并不见于宋刊二十卷本。如《与孟简尚书书》、《原道》、《封建论》中均存在这样的情况,兹以《与孟简尚书书》为例,略作说明:

《与孟简尚书书》	二十卷本批语	三十五卷本批语	《古文集成》所引批语	《古文关键》批语
且彼佛者果何人哉?	无批	再唤起	吕云再唤起	再唤起
其行事类君子邪? 类小人邪?	无批	设为两端	吕云设两端	设两端
进退无所据,而信奉之,亦且惑矣。	无批	关在上两句	吕云关锁上两意	关锁上两意
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诬也。	无批	语壮	吕云辞语壮	辞语壮
分离乖隔,不合不公。	无批	下得好	吕云不公字最下得好	下得好
其亦不仁甚矣。	无批	不仁字最下得好	吕云不仁字最下得好	不仁字最下得好

三十五卷本选篇与批语中存在窜伪的原因,盖是书商欲使新版本的内容显得“全面”、“丰富”,以此来吸引读者、增加销量。而伪编的发生时间当是宋末,原因在于,虽然现存最早的三十五卷本是元刊麻沙巾箱本,但此本保留了许多宋刻的特点。如三十五卷本中不见于宋刊二十卷本的范仲淹《答赵元昊书》、欧阳修《论杜韩范富》、苏轼《代张方平谏用兵书》、胡铨《上高宗封事》、胡寅《上皇帝万言书》等,于“陛下”、“祖宗”、“天朝”、“太后”等字上皆空格,以表尊敬。“恒”、“贞”、“构”等字亦缺笔避讳,可见元本自宋本而来。

## 五、书贾对《崇古文诀》版本的影响

《崇古文诀》经楼昉手定,由其亲炙弟子先后刊刻,篇目始终是168篇,未曾改变,这一点经上文辨析已十分明确。其版本系统本应非常单纯,而又为何会

出现与其选篇不相符的二十卷本、三十五卷本，以及与其原始书名亦不符合的《迂斋标注诸家文集》呢？又为何在三十五卷本中会混入《古文关键》的选篇及批语呢？笔者以为造成《崇古文诀》版本复杂、伪编杂出的原因在于书贾在刊刻这一流行的科举用书中所起的作用。

《崇古文诀》在南宋后期风靡一时。楼昉虽然仕途不显，但教学业绩突出，从学者众，杰出之士亦多。《延祐四明志》载其“从学者凡数百人，最显者郑清之、应麟、郑次申、赵与欢辈”。郑清之与郑次申同为鄞人，同登嘉定十年吴潜榜进士，在绍定、端平、淳祐年间四次入相，位极人臣，郑次申淳祐间任福建转运判官，应麟则是嘉定十六年进士，试南省第一，淳祐九年任参知政事。淳祐十一年，因郑清之之请，朝廷追赠楼昉为“龙图阁待制”，清之还在鄞县立甬东书院，率领楼昉众弟子祭祀先师。可以想见，楼昉作为优秀教师的声名也必然会随着众弟子官运的亨通而愈加响亮。他所编的《崇古文诀》的影响力也会因此不断提高。加上《崇古文诀》本是楼昉在四明、金华、太学教授时所用教材，在学子中已积累了相当的口碑，到陈森刊刻时，已有“千呼万唤始出来”之势。《延祐四明志》言楼昉“以古文诀授诸生”<sup>①</sup>，“尝手编历代文章为一编，业进士者咸诵之”<sup>②</sup>。可见此书在举子间甚为风靡。王霆震、刘震孙所编二书皆是刻于建阳的科举用书，反映了当时举子的需求，其中皆大量征引《崇古文诀》，也可佐证此书在南宋后期、理宗朝以后的科举市场上是极为流行的。

如此风靡的应试宝典，必然会引来书贾的翻刻。静嘉堂藏宋刊二十卷本，傅增湘判断为“建本”<sup>③</sup>，现存最早的三十五卷本也是麻沙巾箱本，可见，《崇古文诀》的刊刻集中在福建建阳，这是刊刻科举用书的集中地。而二十卷本、三十五卷本的形成也与坊刻本的特点有关。如上文所述，二十卷本的失收，可能源于书贾控制成本的考虑，而三十五卷本的伪编也当是书贾试图以更为“全面”、“丰富”、“新异”的内容来吸引读者的牟利手段。而且，不管是二十卷本、三十五卷本，还是《迂斋标注诸家文集》，其共有篇目的排列顺序基本一致，只是中间会多出或少一些篇目，可见众本的来源是相同的，都是以陈森刻本为直接或间接的底本。众本的差异产生于对祖本的增入或删去，这也是书贾刊刻科举用书时常有的行为。

总之，《崇古文诀》在南宋后期因为颇受举子欢迎而不断被刊刻，刊刻时书贾出于自身的需要而对篇目进行增删，形成了不同的版本，造成《崇古文诀》版本系统复杂的局面。通过这一个案，我们也可以窥知南宋书坊活跃的刻书活动对流行书籍的版本产生的巨大影响。

【作者简介】李由，女，南京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①《延祐四明志》卷一“王深宁先生四明七观”条，袁桷为王应麟《四明七观赋》“又有文章授诀”所作注，第173页。

②《延祐四明志》卷五，第415页。

③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七《迂斋先生标注崇古文诀二十卷》，第1250页。